

往事如昨

开国中将 帮我补棉袄

孙茂杰

1962年春节刚过，济南军区副司令员范朝利中将，率领春节慰问团，乘内长山要塞区慰问守岛官兵。当慰问团到大钦岛时，大钦守备区首长召集机关和各个连队到码头，敲锣打鼓，用最热烈的方式夹道欢迎慰问团的到来。当晚，守岛官兵齐聚在守备区俱乐部，举行春节慰问大会。首长的讲话亲切暖心，烟台吕剧团演出精彩纷呈，整个会场弥漫着令人欢欣鼓舞的气氛。慰问团白天走访连队，晚上演出节目，使单调的军营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了。

那个年代，我当兵下连后，没有军事训练，而是参加繁重的国防施工，全连三班倒，昼夜不停工，基本没有节假日。天天穿着破旧的施工服上下工地，钻眼放炮运石渣，又脏又累还可能得矽肺病。岛上的冬天，寒风刺骨，连队的宿舍虽然有个取暖的煤炉子，但白天不用晚饭时才开始用，九点熄灯时必须关火。为了熬过冰冷的寒夜，全班战友睡在用多个木板床拼接在一起的大通铺上，把棉袄搭在自己的被子上，人挨着人挤在一起，这样一来，身上暖和了，脑袋却冻得慌，只好戴着棉帽子睡觉，硬是顶过了数九寒冬。

海岛的艰苦让我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磨炼，最难忍受的是海岛的孤独与寂寞，特别是在连队过的第一个春节，使我很难适应。大年三十晚上各班吃了一顿自己包的饺子后，全连集合在一起，战友们自告奋勇演节目，班排之间拉歌，完全没有在家乡穿新衣放鞭炮，走亲串门拜年的味道。虽然在远离家乡的小岛上与战友们共度春节很有新鲜感，但因为这是我人生十七年来第一次离开家人过大年，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情绪如同海岛的浓雾紧紧地缠绕着我，挥之不去。我庆幸慰问团的到来，那些满腔热情的慰问活动，冲淡了海岛的孤寂，缓解了我心里的郁闷，低落的情绪高扬了许多。尤其是慰问团走访连队时，兼任慰问团团长的范朝利将军，对士兵体贴入微的关怀，深深打动了每一位战友，激发了大家挑战艰难困苦的勇气。

那天，范朝利将军带领慰问团来到大钦守备一连，首先走进我们步兵排，全排战友着装整齐地站立在床前，热烈鼓掌欢迎。首长亲切地与每位战士握手，嘘寒问暖。身材高大魁梧的范朝利将军，走到我们班通铺前停了下来，伸手摸了摸那单薄的棉褥子，敲了敲床板，又环视了一下全排的内务，然后饱含深情地告诉大家：军区党委、首长惦记着守岛官兵，关心你们的冷暖，准备解决海岛的潮湿和寒冷问题，将陆续地给每位干部战士发一床毛毡垫子，对同志们守岛建岛做出的无私奉献表示真挚的慰问！首长的话，似一股暖流融入战士们的心头。

将军示意大家坐下后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拉着我和他一起坐在床沿上。这突如其来的零距离接触，弄得我既紧张又困惑，满脑子都是问号。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一位素不相识，佩戴着中将军衔的大首长，为什么唯独和我一个小列兵坐在一起？正当我心慌意乱之时，首长忽然转向慰问团成员高声问道：“谁带来了针线？”只见慰问团一位女同志应声拿着针线走了过来，首长指着我的棉袄肩头说，这位战士的棉袄破了，棉花都露了出来，咱给他缝补好吧。至此，一直发蒙的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我不小心刮破了的棉袄给闹的，心想这位大首长的观察实在细致，我的棉袄肩头破了个小口子，也没有逃脱他那敏锐的目光。

这一刻，一位开国中将与一个列兵并肩而坐，帮我扯着衣角，静静注视着针线在棉袄破碎处穿梭那一幕，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我羞涩得涨红了脸，不好意思地穿起缝补好的棉袄，默默地感受着将军无微不至的关怀，仿佛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，亲人般的体贴，从心里对这位高级将领充满了敬意。

我在回忆范朝利中将帮我补棉袄这段往事时，不由得想起了朱德总司令帮助红军战士补草鞋的故事。前者补草鞋，后者补棉袄，虽然跨越我军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，但是首长关爱士兵的传统却一脉相承，这种优良传统把司令员和士兵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

本文提到的那种款式的棉袄，我穿过两套，是我军55式、58式棉服。这些棉袄棉裤是由棉平布做表里，内絮棉花加工制作的，有较好的御寒作用。但既不耐脏又易破损，穿在年轻的战士身上，摸爬滚打一个冬天就破旧不堪，棉袄袖子磨得油亮油亮，像打了一层蜡。棉裤的膝盖、臀部及裤脚更是常常被磨破碎裂，有碍军容仪表。因此，一年一更换，以旧领新成了制度。换下旧的用作施工服，一直到不堪使用为止。那时，老兵常以穿棉袄的件数为资本，动不动就以“你个新兵蛋子才穿了几件小棉袄”这句话来开玩笑。大约在1963年，全军进行了以冬服结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，以罩衣、紧身棉衣、绒衣等组成的多层次棉服，取代了长期装备部队的“老棉袄”。如今我看到战士们穿的棉服既保暖，又威武。变化之大，真是今非昔比啊！

帮我补棉袄的范朝利将军，是河南新县人。他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走过万里长征，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，1956年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，2012年因病逝世，享年99岁。

烙在岁月里的油饼香

王忠华

我总想起中学时曾吃过的油饼。它不算是正餐，是母亲给我备下的零食。

我就读的中学在离村子十公里外的镇上，每天往返路程遥远，便寄宿在学校里。红瓦白墙的一排平房，挨着东山脚下，隔着一条终年潺潺流淌的小河。每到周一，一千多名师生聚集在操场上，观看五星红旗冉冉升上瓦蓝的天空。

校园大门外，是镇上唯一的集市街。逢五逢十，吆喝声、讨价还价声隔着围墙飘进来，撩拨着少年们对外面的世界那点可怜的想法。周六午后，同学们便迫不及待地跨上“大金鹿”自行车，铃声汇成潮水，朝着四面八方散去，校园瞬间阒无一人，空空荡荡。待到周日下午，那铃声又如约由远及近地响来，仿佛非洲草原上一次次浩荡的大迁徙。归来时，每人的行囊总是鼓鼓的——粗布包、提篮，也有拎着斑驳硬实的黑色人造革皮包的……无论哪种，里面都塞满了接下来一周赖以抵抗饥饿的给养。

那时学校的伙食，不过是两毛钱一碗的清水煮白菜，光亮的汤面上吝啬地漂着一两片透明的肥肉；最恼人的还是那每周几顿、雷打不动的“窝窝头”，有时硬得像座石山，在课桌上岿然不动，有时又湿漉漉、软塌塌的，像被秋霜打蔫的菜叶，那模样着实让我难以下咽，以至于每次回家，提篮里除了一块棉布，总还躺着几个被我偷偷带回去的“窝窝头”。我的肠胃早被清汤寡水涤荡得空空如也，于是在饥肠辘辘中，总渴望着一点油水的慰藉。

我们居住的宿舍是用木板搭成的上下两层大通铺，二十几位同学挤在一起，不设防，也无隐私。每每晚自习过后，熄灯铃响之前，宿舍便成了喧闹的海洋。昏黄的灯光下，人人像变戏法似的，拿出各式各样的零食：一瓶腌浸的萝卜条，一罐子个头饱满、翠绿色的“大茶豆”，几片软糯的熟瓜干……家境好些的同学，会有几个白面烙的火烧，我甚至还瞥见邻铺的包里那一小瓶乳白的牛奶。

我的慰藉，便是母亲为我准备的油饼和一小袋花生米。

那油饼，我至今想来仍觉得不可思议。它很厚，似乎只有三层，上下是烙得微黄的面皮，中间实墩墩的。我总疑惑，母亲得用多大的耐心，才能将那厚实的面坯烙透、烙熟。晾凉后，再用刀切成不规整的小块，用一块洗得发白的旧棉布仔细包好，放进我随身携带的篮子里。

它的使命通常如此：一块冷掉的油饼，佐以几粒脆生的花生米。当烙熟的面香遇上了花生的甜香，

那浑厚的滋味交糅在一起，便成了我至高无上的盛宴。至今我仍相信，那绝对是餐食中天衣无缝的完美搭配。

我们趴在铺上，借着昏暗的灯光，大口咀嚼。那油饼并无精巧的滋味，只有浓重的、熟透了了的油香，混合着纯粹的小麦香，粗糙而扎实地填满口腔，也熨帖了我空空的胃肠。一口下去，仿佛一日所有的疲惫与清寒都被这实在的温暖驱散了。

我固执地称它为“老油饼”，而不只是“油饼”。

一来，时光确实久远。过去了三四十年，往事的轮廓早已模糊，可那股油香与麦香，却在记忆里愈发清晰、活色生香。它像一阵晚风，每当在脑海里沐浴其中，内心便泛起一种宁静的甜，和一丝淡淡的、无从追挽的怅惘。

二来，它与如今街上随处可见的油饼实在大相径庭。无论是金黄油酥的葱油饼，还是层次分明的手抓饼，都无法与它那笨拙憨厚的样子相提并论。可就是这其貌不扬，甚至有些“丑陋”的油饼，用它那一缕最质朴的油润香气，浸润了我整个中学时代，丰盈了那段清贫岁月里寡淡的味蕾。

前些时日，我居住的楼前的街对面新开了一家饼铺。明档操作，玻璃澄亮，售卖各色精巧的饼点。我偶尔驻足，却从未买过。一个清寒的傍晚，我下班晚些，终究抵不住那满街飘香的诱惑，走进了饼铺，选了一个临窗的位置，点了名字极时尚的“草帽饼”和“螺丝饼”。

那些饼太漂亮了，薄如蝉翼，千丝万缕，在灯光下简直像精巧的艺术品。我用筷子小心翼翼地提起一片，它油亮剔透，与我记忆里那块笨拙的“老油饼”大相径庭。

有时和八十多岁的母亲闲聊，说起四方吃食，我也会提及求学时她为我烙的那“老油饼”。母亲脸上会浮起一丝笑意，那笑里却带着苦味。她常避开我的目光，望向窗外，轻声地感叹：“唉！那时候，真是要什么没什么。一个鸡蛋，还得掰成几瓣分给孩子们……”母亲平静的语气里，我却听出了深藏的歉疚。

我从未正式地回应过这份歉疚。可在我心里，答案早已被泪水浸透，一遍又一遍地冲刷清晰——

妈妈，您错了。在往后所有这些琳琅满目、滋味万千的岁月里，我吃过许多东西，却再也没能找回那样踏实的饱足。您用有限的油和面，在灶火前烙出的，不是一块粗糙的饼，而是我此生再也无法复制的、最奢侈的美味。